

“灰色影子”伴随张学良 30 年

在张学良后期的照片中,身边除了赵四小姐,出现最多的是一个略有谢顶,文质彬彬的人,他就是“张学良将军招待所”所长,负责看管少帅的军统大特务刘乙光,这位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,一生似乎只干了一件事——陪伴张学良度过30年的幽禁岁月。

几次救了张学良的命

1937年初,张学良由南京被秘密转移到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,幽禁在雪窦寺。不久,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来到溪口陪伴他。刺杀,就在此时发生。行刺者,是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。

袁静枝的丈夫蒋孝先是蒋介石身边宪兵第三团团长,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中因曾指挥宪兵抵抗,遭东北军逮捕击毙,所以她一直将张学良视为仇人。张学良到达雪窦山之后,袁静枝也寻踪而来。她曾有两次刺杀张学良的机会,第一次是在雪窦寺大雄宝殿,因仓促相遇未及动手;第二次则是利用了张学良每天与于凤至外出散步的机会,在妙高台枪击了张学良。

袁静枝毕竟是一未经军事训练的知识女性,故第一枪并未命中,就在她准备打第二枪时,刘乙光已经朝枪响处扑去。张学良和于凤至则急忙蹲下隐蔽,吃惊地望着袁静枝被刘乙光抓住。袁静枝试图反抗,这时于凤至拿出了“大姐”的勇气,毅然站在了张学良的面前,对袁静枝道:“我是汉卿(张学良字汉卿)的妻子,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汉卿是你的杀夫仇人,那就让我代他一死。”

这一举动让袁静枝和张学良都敬佩不已。袁静枝因此怅然下山,张学良亦未令人阻拦。后来,蒋介石给了袁静枝一笔钱,意在息事宁人,此事遂罢。

张学良亲口回忆,刘乙光救自己并不仅仅这一次。1941年5月,张学良在贵州桐梓龙岗山幽禁地感到腹痛,虽服药而无效。当晚疼痛加剧,经随行医生检验,确认是急性阑尾炎,需要马上手术。此时的少帅早已风光不再,人人都知道蒋介石深恨张学良,没有他的命令将张带离幽禁地有掉脑袋的风险。

但刘乙光承担了责任,在来不及向重庆请示的情况下,将张学良急送已迁到贵阳的中央医院。入院时,张学良的阑尾已经穿孔,并引发腹膜炎,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,挽救了张学良的生命。因为这件事,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,曾对人说:“若刘乙光按部就班地请求待命,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,那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
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可能是人世间最对立的。但张学良和刘乙光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:一方面,张学良和刘乙光不时发生些大大小小的冲突;另一方面,张学良对刘乙光又有一份理解。张学良晚年时,有记者要他评价刘乙光,张学良说:“刘乙光有他的立场,我还是很怀念他的。”

刘乙光曾是共产党员

刘乙光原名刘书之,字乙光,湖南永兴县人,生于1903年,早年聪颖,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——这里也是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展开革命工作的地方。在校期间,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兄长给了他重要的人生指点和帮助,这个人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。黄克诚此时受党组织安排,入广州中央政治培训班学习,临行前与刘乙光谈心,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。刘乙光对黄克诚很服气,便依嘱而行,1926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,并在北伐战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这一期学员中出了很多日后为人们熟知的人物,可谓将星如云——共产党中有林彪、刘志丹、李运昌等;国民党中则有谢晋元、张灵甫、胡璉等,每一个都曾经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刘乙光也曾从戎作战,在第八军唐生智部参加了北伐战争。不过,唐生智与蒋介石矛盾重重,“四一二”事变之后,其部队中的黄埔生便面临清洗的命运。刘乙光弃职而走,另谋出路,却又没有旅费,结果,遇到了黄克诚,黄克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刘乙光,使他能够度过困难时期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刘乙光失去了和共产党组织的联系。不过,他和共产党的缘分并没有就此中断。1929年,黄克诚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挫折,在经过长时间颠沛流离后,才和党组织取得联系,奉命到武汉从事地下兵运工作,刘乙光给黄克诚帮了很大的忙。

当时,黄克诚找到刘乙光,表示自己希望打入国民党部队作兵运工作,刘乙光居然为他伪造了一份文凭和一份作了几年小学教师的履历,使黄克诚顺利进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师的政训处,当了一名少尉科员。

刘乙光和黄克诚分手的时候,曾讲过可能去参加红军,但最终没有去。黄克诚大将至死不知这位小兄弟后来的命运,还曾为他嗟叹不已。或许因为政治思想发生改变,刘乙光最终还是跟了

国民党,后来被分配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。

相伴 30 年 是看守也是“服务员”

张学良的幽禁生涯,显然不同于普通囚徒。刘乙光这个看守在重重压力下做得也极有特色,一方面,他严格地按照要求剥夺张学良的自由;另一方面,他又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。比如,刘乙光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不好交差,会千方百计安排他出去走走,甚至去逛街,倒是张学良很乏这样的心情。特务们还设法和张学良打麻将消磨时间……

对一个失势“少帅”照顾到如此程度,刘乙光当然不是圣人,前期他善待张学良的初衷,是和戴笠的吩咐,以及宋美龄、宋子文等的叮嘱有很大关系——“少帅”虽然失势,但对于他的这班朋友,刘乙光一个也得罪不起。

到了1946年戴笠撞山身死,蒋介石因内战失利迁怒张学良愈深,刘乙光对张学良的态度也有过一段转劣时光。好在这时候的刘乙光还有一条底线——“二二八”事变(1947年2月28日,台湾人民反专制、反独裁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)时,张学良被困于台湾新竹温泉,刘乙光接到命令,必要时杀掉张学良。然而,此时在几乎绝粮的情况下,刘乙光却保证张学良每天能吃上米饭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,张学良和刘乙光的关系又一次转好。以至于他们相处的最后几年,张学良的日记中经常出现“老刘”为他可能获释欢喜不已,遇到他要耍脾气的时候“苦劝”——这种苦劝常使张学良避免不可知之祸事。过后,张学良会感慨“老刘好意可感也”。

两家的关系亦让人意想不到的亲密。刘乙光长子刘伯涵曾写道:“我妹妹与四小姐特别亲,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,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啾啾私语。”

张学良将军幽囚的30年时光,刘乙光何尝不是共同的囚人?其实,他们的利益也有一致的地方——平安地度过这难熬的岁月。

刘乙光死去的时候十分寂寥,除蒋经国之外,只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去吊唁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萨苏/文

白求恩来华首诊在武汉

1938年1月8日,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,携助手兼翻译尤恩等,乘“亚洲皇后”号海轮,从温哥华港启程,经香港于2月7日下午飞抵武汉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白求恩一行安排在汉口鄱阳街34号一家圣公会教堂主教住的小楼里。

次日,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安排白求恩会见了周恩来。白求恩向周恩来强烈要求马上到前线工作,但因武汉正遭受日寇轰炸暂不能走。在武汉的半个月中,白求恩和尤恩到兴隆隆诊所(现在的武汉市第五医院)工作了一周时间,用带来的药品和器材救治伤病员,挽救了众多生命。

尤恩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之一,她辞去工作与白求恩同行。后来,她回到加拿大

写了回忆录《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》,书中详细描述了白求恩在兴隆隆诊所救治伤病员的情况:“到武汉的第二个星期,白求恩来到汉阳的一所医院,冒着生命危险与医疗队成员一道抢救伤员。候诊室里挤满了上次空袭时受伤的人员,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……白求恩大夫忙于截肢、止血、取出弹片等等,血腥味钻进鼻孔,长时间去不掉,但当时,我们都顾不得这些。”这期间,白求恩和尤恩还多次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,出诊医治伤病员。

在周恩来的安排下,白求恩和尤恩于2月22日离开武汉,辗转到达延安。后来,白求恩率医疗队辗转山西五台山等地,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。

据《武汉文史资料》麻建雄/文

